

新教育與新女性的誕生

文／許佩賢（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臺灣史研究所教授兼所長） 圖片提供／國立臺灣圖書館



▲臺灣公立女子高等普通學校第一回卒業生。

「我是文明女，東西南北自由志，逍遙又自在，世事如何我不知……」這是1932年臺灣流行歌曲〈跳舞時代〉的歌詞，透露出1930年代臺灣社會的摩登氣氛。雖然這裡的文明女，好像意指打扮時髦、流連舞廳的「黑貓」，但不論是不是「黑貓」，進入20世紀以後，要成為文明女，新式教育是基本配備。

女子教育的建立

近代教育的特色之一即是全民皆學，不論性別、階級都是國家教育的對象。因此，雖然在清末的臺灣已有少數西洋教會學校也有收容女性，但是以國家的力量全面性的推動國民教育，還是要到日本統治以後。

日治時期臺灣人女性教育機關，始於1897年成立的國語學校第一附屬學校分教場，收容8-30歲臺灣女性，教授國語、修身、手藝等科目，其後制度幾經變革，至1922年改制為臺北第三高女，為臺灣最具代表性的女子中等學校。

1898年公學校成立，不分男女皆可入學。但受到社會觀念或經濟狀況限制，女生就學率成長得極為緩慢，一直到日本統治結束前，才勉強達到60%。入學以後中途退學者也不在少數，因此，我們甚至可以說，整個日本統治時期的大部分時間，大部分的女性並沒有上學機會。

第一位留學日本的女性

雖然女子教育進展緩慢，但臺灣女性留學日本卻是很早就有的事。早在1898年，到處都還在兵荒馬亂、百廢待舉之際，有兩位臺灣女性——吳笑及黃鶯，啟程到日本留學。兩位都是臺南人，幼時皆曾於新樓女學校（今長榮女中前身）就讀，1898年12歲時隨來臺考察的日本教育家巖本善治赴東京，進入明治女學校就讀。一去十年，中間未曾歸臺，至1908年完成學業才回臺，受到各界注目，《臺灣日日新報》大篇幅報導「本島出身的兩才女」。兩人回臺後，皆擔任公學校教職一段時間，但離職後去向不明。

受高等教育的女性們

陳笑與黃鶯之後，陸續有許多臺灣女性踏著前輩的足跡到日本留學。

嘉義出身的許世賢（1908-1983），1919年公學校畢業後，進入臺南女子高等普通學校就讀。1922年〈新臺灣教育令〉發布，第一屆三年制學生畢業，但包括許世賢在內，也有少部分學生繼續念新制的高等女學校，於1923年畢業。許世賢其後



▲陳進是第一位入選帝展的臺籍女畫家。

▶蔡瑞月自創的〈印度之歌〉舞蹈，1946。
（圖片提供／蔡瑞月文化基金會）



赴日本東京女子醫學專門學校留學，畢業後返臺開業；1933年又隨同為醫師的夫婿赴九州帝大，取得醫學博士學位。回臺後開設順天堂醫院。戰後長期從政，於醫界、政界都受到重視。

新竹出身的陳進（1907-1998），1926年畢業於臺北第三高女，隨後至日本東京女子美術專門學校留學，1927年以學生時代習作入選第一屆臺展東洋畫部。1934年，以〈合奏〉入選日本帝國美術展覽會，成為第一位入選帝展的臺籍女畫家。1934至1937年任教於屏東高女，為少數在高女任教的臺籍老師，期間創作許多以三地門原住民為主題的畫作，戰後長期活躍於臺、日兩地畫壇。

臺南出身的蔡瑞月（1921-2005），從小就喜歡舞蹈，就讀臺南第二高等女學校時，看到來臺演出的石井漠舞團表演，心生嚮往，1937年高女畢業後即赴日，跟隨石井漠習舞，其後無數次隨舞團至日本、東南亞各地表演。1946年返臺的船上，自創了〈印度之歌〉與〈咱愛咱臺灣〉等舞蹈。之後數十年，即使在白色恐怖的牢獄中也不曾中斷創作，一生都編舞、教舞。

「只有」公學校學歷的女性

並不是只有受過高等教育、留學的女性有機會成就自己。作家鄭鴻生的母親施傳月，1930年出生於臺南，家裡經營傳統雜貨店，公學畢業後，和大部分同學一樣，沒有繼續升學，在家裡幫忙雜貨店生意。有一天，意外發現包東西的字紙中有日本婦女雜誌的洋裁教學，大受吸引。

受過公學校教育的施傳月懂得基礎的日文，公學校課程中也有簡單的裁縫課，因此，她可以看懂舊字紙中的洋裁教學。她開始自學裁縫，買了一臺縫紉機在家幫忙人家修改衣服。漸漸的，她感到不滿足，到街上大型洋裁店應徵裁縫女工，因有實際經驗順利錄取。洋裁店裡有許多日本師傅，有最先進的日本流行雜誌，店裡洋溢著文明氣氛，在這裡，施傳月練好了基本功，但她又想更上一層樓，想到日本學習洋服設計。

一個只有公學校畢業的女孩子，可能連臺南也沒離開過，為了夢想，鼓足勇氣隻身到日本學習洋裁。學成後回臺開設洋裁補習班；翌年穿著自己做的白紗禮服結婚。洋裁補習班橫跨戰前戰後，持續了60年。

這些女性因受了新式教育，給自己打開了一扇通往世界的窗，靠著文字的力量，她們作夢、逐夢，她們為自己、為臺灣社會、為女性寫下光輝的一頁。



▲鄭鴻生為母親施傳月所寫的故事《母親的六十年洋裁歲月》。
（圖片提供／印刻出版社）